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Rear Areas
Mobilization and Rural Area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 ——战时总动员与农村

〔日〕笹川裕史 奥村 哲 / 著
林 敏
刘世龙 / 译
徐 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抗战时期中国的 后方社会

——战时总动员与农村

〔日〕笹川裕史 奥村哲 / 著
林 敏 刘世龙 徐 跃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
(日) 笹川裕史, 奥村哲著; 林敏, 刘世龙, 徐跃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5467 - 2

I. ①抗… II. ①笹… ②奥… ③林… ④刘…
⑤徐… III. ①抗日战争 - 后方 - 社会生活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65.07 ②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580 号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

——战时总动员与农村

著 者 / [日] 笹川裕史 奥村哲
译 者 / 林 敏 刘世龙 徐 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天华

责任校对 / 李佳佳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467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802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5.00 元

印 张 / 12.2

字 数 / 21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UGO NO CHUOKU SHAKAI

Nicchu sensoka no sodoin no noson

By Yuji Sasagawa and Satoshi Okumaru

© 2007 by Yuji Sasagawa and Satoshi Okumaru

First published 2007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3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事件，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

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在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



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在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中文版序言

自本著原文版(日文版)出版以来,已过去六年时光。本著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支撑中国抗战大局的后方社会的实际状况,出版当时,在日本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专业学术刊物上登载的书评以及对本著的介绍文章达十余篇,《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也刊载了不少肯定的书评。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不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就连日本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本著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日本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且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以及战争时期日本国民遭受的创伤上。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问题方面,研究视点也多局限于毛泽东、蒋介石等中国政治领导人卓越的战略和业绩。

有别于以上视角,本著力求从正面探讨支撑中国抗战大局的基层社会,详实地描绘那些受时代摆布、名不见经传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变化状况。笔者以为,就此而言,本著与日本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的其他著作相比,独具特色。阅读过本著的日本读者就曾表示,本著令他们再一次感受到抗战期间中国民众的残酷经历。

本著日文版出版之际,正值日本史研究学界开始反思过去的法西斯体制论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他们立足于战时问题与战后问题的连续性这一研究视角,提出了“总体战导致的社会变迁”这一全

新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著具备了可与日本史研究的新趋势积极呼应的元素。虽然本著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期间，但笔者认为，其中所窥见的中国基层社会的混乱与变动，不仅只作用于当时的社会，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动荡埋下了伏笔。20 世纪的战争所具备的总体战特征分别给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基层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本著试图立足于全新的视角，通过比较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2007 年 5 月，以本著的出版为契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基层社会史研究会。在该研究团队中，关注相同问题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与日本史研究学者打破专业界限，坦诚地交流学术思想。在大家的努力下，以上提及的在比较史研究领域的尝试，视野愈加开阔，分析研究愈加深刻，研究活动一直持续至今。2010 年 7 月，还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中国的优秀学者出席。作为这一共同研究的中期报告，今年 3 月，本著的另一执笔人奥村哲主编并出版了《变革期的基层社会——总体战与中国·日本》（创土社出版。除奥村哲之外，原田敬一、笹川裕史、王友明、吴毅、吴帆、山本真、野田公夫、丸田孝志、泉谷阳子等人也参与执笔）。此外，笔者还以国共内战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一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社会史》（讲谈社，2011 年 9 月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作均是对本著研究问题的继承与发展。笔者也由衷地期待以上研究成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读者见面。

最后，对承担本著中文译本翻译工作的四川大学的刘世龙教授、林敏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对毅然决定出版本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还有为联系出版事宜而尽力的四川大学徐跃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中国的读者将如何看待本著呢？对此，笔者既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

作者代表 笹川裕史

2013 年 3 月

绪 论

研究视点——中国后方社会

20 世纪以来，世界战争的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入了“总体战”时代。国家为了支撑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动员全社会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整编。在 1937 ~ 1945 年的八年抗战时期，“总体战”的特征也毫不例外地在中国社会得到体现。

在研究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时，人们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日军的直接破坏以及大量掠夺方面。然而，战争留下的创伤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抵抗日军侵略的一方，中国举全国之力与日军抗衡的事实。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情况一样，中国也大量、紧急地征用并动员了应对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在战争初始阶段，中国沿海一带相对发达的便被日军占领，这意味着抗战之前占国家税收约八成的财源已被日军掠夺。因此，中国国内经济落后的内陆农村便成了支撑抗战的大后方。抗战期间的大后方，数目庞大的以粮食为主的物资被征用，动员了不计其数的民工直接从事战斗或从事其他劳役。

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实施战时粮食征用的时间是在 1941 年的下

半年，直至抗战结束，大致历时 4 年。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日本占领区、中共统治区除外）大约共征用 2310 万千升（参见表 0 - 1）的米、麦（包括稻壳。此外，当时统计粮食容量的正式单位为

表 0 - 1 粮食征收量年度统计

A 国民政府统治区全域

单位：万千升

年度	目标量	实际征收量	征收率(%)
1941	456	458	100.4
1942	650	661	101.8
1943	632	648	102.5
1944	663	543	81.9
合计	2401	2310	96.2

说明：统计数据为实物征收的田赋与强制购买的粮食（借贷）的合计。1944 年度的“实际征收量”一栏为截至 1945 年 5 月 15 日的统计。原表单位为“市石（= 100 升）”。参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第 46 页。

B 四川省

单位：万千升

年度	中央制定的目标量	实际征收量	征收率(%)
1941	120	138	115.0
1942	160	166	103.8
1943	160	161	100.6
1944	200	194	97.0
1945	200	182	91.0
合计	840	841	100.1

说明：统计数据为实物征收的田赋与强制购买的粮食（借贷）的合计。通常从当年 9 月开始征收，但 1945 年提前征收。表中数据为截至 1945 年 9 月下旬的征收量。原表单位为“市石（= 100 升）”。参见陈志苏、张惠昌、陈雁骢、于笙箴《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 2 卷，1996，第 370 ~ 372 页。

“市石”，1市石=100升）。需要说明的是，该数字不包含在农村最基层征收的各类名目繁多的临时征收项目。除此以外，抗战8年间，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大约有1405万青年男子被征兵服役（参见表0-2）。其中，大约1204万人被分配至各个部队。^①同时，为了应对战争，还有大量的体力劳工被强制征用于各类工程及防卫设施等的建设中。

表0-2 国民政府统治区年度征兵数量统计

单位：人

年度	国民政府统治区征兵总数	四川省征兵数量	四川所占比例(%)
1937	928310	103837	11.2
1938	1648913	174145	10.6
1939	1975501	266341	13.5
1940	1901339	266625	14.0
1941	1667830	352681	21.1
1942	1711132	366625	21.4
1943	1666918	352681	21.2
1944	1611342	391112	24.3
1945	939236	283086	30.1
合计	14050521	2557133	18.2

说明：国民政府统治区征兵数量参见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0期，1991，第157页；四川省征兵数量参见戴高翔《抗战时期之四川役政》，《四川文献月刊》第11、12期合刊，收录于侯坤宏编《役政史料》上，“国史馆”，1990，第481~482页。此外，侯坤宏列举的四川省征兵数量合计为2578810人，与戴高翔数据略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后方社会便不会有如此长时期的巨大付出。后方人民所遭遇的灾难也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带给

^① 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国史馆馆刊》复刊1991年第4期，第159~160页。

中国人民的苦难之一。

毋庸置疑，在抗日战争这一艰难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也不乏充满救国热忱、毫不吝惜地贡献出自己生命财产的人。对于他们的奉献精神，固然应该彰显，然而，笔者认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后方社会的全部。其原因主要在于，如果将这一特殊群体置于社会主角位置的话，描绘出的景象便与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社会的实际状态相去甚远。其次，这一视点还将掩盖抗战时期矛盾重重、乱象丛生的社会特征，并妨碍我们客观地认识战后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厚重的历史遗产。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更多地关注后方社会的普通群体，在本著登场的对象也大多是在抗战时期各种战时征用的严酷压迫下，苟延残喘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姓。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探讨展现出虽未被纳入“胜利的民族主义”的成功事例中，却能如实反映抗战时期在呻吟声中挣扎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

大相径庭的后方社会——日本与中国

在“总体战”态势下，中日两国同样都面临着严酷的战时征用。然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日两国的社会条件截然不同的事实，这也是本著重要的研究视点之一。对于该问题的阐述，将在各章中进行，在此仅简单概括如下要点。

大体而言，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近代日本在发展进程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曲折，却率先在亚洲实现了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型的目标，国家对社会控制得以迅速实现。比如，1873年实施的“地租改正”，使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注册登记。又如，日本自1871年便开始完善户籍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以“全民皆兵”为理念的征兵制。在政府的主导下，即便是退役军人，也作为“在乡军人”被有组织地编入了预备役、后备役。1910年，日本各地的“在乡军人”

团体联合组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不但能有准备地接受紧急状况下的再次征召，还积极从事各类与征兵有关的活动，如对即将入伍的士兵进行预备教育，士兵入伍、退伍时举行送迎活动等。^① 总之，在日本，应对战争所需的粮食征集、士兵征召等的行政基础早已健全完备。

第二，从社会层面上看，日本已经具备进行战时征用的社会土壤。如同“村落社会”一词所代表的那样，近世以来逐步形成的日本的社会构造具有极强的“集团性”特征，它要求“村落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即便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也必须将集体的共同法则置于首要位置。此外，日本还于1886年实施了义务教育，对其善恶利弊姑且不予评论，就结果而言，在教育、媒体舆论的宣传诱导下，为了国家不惜生命的意识已经在国民心中形成。当然，使国民达成这种共识的思想基础便是“教育敕令”等所代表的天皇制意识形态。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如果有谁被指责为“非国民”，便意味着他的存在被社会彻底否定。

由于具备了以上社会条件，日本政府通过一张薄薄的“红纸”（征召令）便可轻而易举地从农村征募大批的青年男子入伍，政府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每户农家的详细状况，并严格实施战时粮食管制。总之，可以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完全具备了支撑“总体战”的特征。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使日本失去了对战争前景的正确判断，大大延迟了战争的终结。这一结果，不仅加剧了战争带给亚洲各国的灾难，也使日本国内的冲绳、广岛、长崎败战的悲剧更加深重。

另一方面，奋起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国内社会的状况又如何呢？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由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然而，事实

① 吉田裕：『日本の軍隊——兵士たちの近代史』岩波新書、2002、655頁。

上，其权力并未细微到能够掌控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点，也是常常被误读之处。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基本上到县一级为止，且严禁县级官吏（知县，后改为县长）赴本籍地做官，任职地也必须几年一换，时常变更。那些非本地出生、不熟悉管辖地状况的官吏，却不得不与数名辅佐官（幕僚）一起统治辖下数十万百姓，真正能够切实执行的行政治理仅限于最低限度的征税、维持治安等而已。在这一点上，近世日本的幕藩统治反而更能将其行政权限延伸至社会最底层。在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化进程中，由于其间伴随着反复不断的政局动荡，因而，除部分发达地区或大城市之外，并未能加快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受这些因素影响，直至抗战爆发前夕，中国连户籍、地籍这些作为战时征用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制度都尚未完善，基层行政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也极其粗放。此外，征兵制度也是在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才终于得以在部分地区实施。以上事实，极富象征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社会面临的困难也十分巨大。中国传统的社会构造，组织性低下，缺乏日本社会中的“集团性”。在中国的村落社会中，靠约定俗成的规定去严格限制百姓行为的自律能力十分欠缺。^①即便是牢牢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宗族（父系血缘集团）以及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其组织能力都千差万别，与其说是具有严格规范的稳定的团体，不如说其组织特征在于较大程度地依赖强有力的个人及其人脉关系。^②毋庸置疑，社会构造上的这一特征与以上所论的国家对社会统治能力的低下不无关联。

另外，即便是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化进程以后，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教育、舆论信息的普及程度仍十分低下，一种思想理念很难在国民意识中得到渗透。虽然中国的近代教育可以追溯到清末，

① 足立启二：『専制国家史論』、柏書房、1998、54～62頁。

② 山田贤：『中国の秘密結社』、講談社、1998、106～127頁。

但从法制上确立全国义务教育的时间则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以后。^①

如以上所述，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后方社会的社会条件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近代”这一时代，生活在当今的我们，自然能够将其批判性地相对化。于我们而言，中日双方孰为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从支撑“总体战”的视点分析，中国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却远远大过日本。可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者却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为此，我们不得不深刻地认识这一事实，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视点投向完全有别于日本后方社会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后方社会。

本研究的课题与构成

简要概括以上论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抗战时期中国所进行的空前规模的战时征用是在尚未成熟的近代国民国家的状况下完成的。在此条件下，支撑“总体战”的中国后方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日本社会完全不同的特征与矛盾。比如，国家对社会统治能力的低下，必然造成战时征用的粗暴化和极大的不公正，使后方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极度混乱。在这一混乱的深渊中，中国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又将带给中国社会怎样的影响呢？本著将以国民政府的战时根据地四川为研究对象，立足史料，详尽地勾勒出抗战时期乱象丛生的四川社会的特征，并借此揭示在混乱中发生转变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由日本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与日本的后方社会相比具有鲜明特征的另一个后方社会的残酷面貌。

① 石岛纪之：「総論 重慶国民政府論」、石岛纪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4頁。